

---

---

# 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 变化、特征与动因分析

卢昊

**内容提要：**自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日本对它的态度经历了由消极到积极的变化过程。日本对“一带一路”的政策可以概括为“有限度对接”和“多角度对冲”，即在“一带一路”框架内有限度参与合作，同时在框架外加大针对“一带一路”的对冲。日本转向参与“一带一路”合作，其基本动力源于改善中日关系的“短期需要”，以及应对美国对外政策变化以“预留行动空间”的需求。日本在合作中设置多种限制以确保自身利益最大化，反映出中日合作欠缺必要互信的现实。日本强化针对“一带一路”的竞争措施，主要动力来自对华战略竞争的长期目标，以及国际秩序变动期内争取主导权的强烈意识。日本国内支持与反对“一带一路”的力量与观念并存，其复杂态势将影响日本今后对“一带一路”的应对。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 中日关系 中日合作 战略竞争

**作者简介：**卢昊，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874(2018)03-0063-19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课题“日本外交政策与中日关系”  
(编号：GJ08\_2017\_SCX\_2974)。

自中国领导人对外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倡议）至今，作为中国邻国及地区大国的日本对其的关注度不断提高，政策相应发生变化。现阶段，日本在转向与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合作的同时，也试图维持并彰显在合作理念及政策方式上与中方的区别。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仍有明显保留，并寻求在其框架外采取针对性竞争措施，以实现自身战略利益最大化，体现出“有限度对接”与“多角度对冲”的双重特征。日本的以上政策，受到国际国内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反映出中日间合作与竞争关系的复杂性。

## 一、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态度的变化

自 2013 年秋中国领导人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至今，日本对其态度变化总体上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 (一) 忽略与轻视期 (2013 年下半年到 2014 年上半年)

这一时期，中日关系严重对立。同时“一带一路”刚刚提出，日本对于中方倡议的关注极为有限，日本政府并未作公开评论。日本政府内部评估是：一方面这一倡议究竟是中国新的对外政策口号还是具体的外交构想，“并不明确”；另一方面即使中国有意落实这一倡议，对日本也没有直接影响。日方认为，中国领导人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更多是为了拉近与东南亚和中亚国家关系，不太可能全面落实这一“宏大构想”，没有必要对其专门研究。<sup>①</sup>日本国内媒体也基本没有关于“一带一路”的报道。

随着时间推移，一向对外部形势敏感的日本政府意识到中方开始有所动作。2014 年 5 月初的亚洲开发银行（简称“亚开行”）年会上，在日本主导下，会议搁置了将导致中国在亚开行表决权扩大的增资动议。亚开行行长中尾武彦对外声称，会上中国提出了设立“有别于亚开行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设想”，扩大影响力的意图明显。但日方认为，中国计划建立的银行出资来源不足，新兴国家对亚投行存在质疑，“如果评级很低，筹措资金的成本会很高”。<sup>②</sup>这也反映出，当时日本并不看好“一带一路”前景。

### (二) 关注与消极抗拒期 (2014 年下半年到 2015 年上半年)

这一时期，中日关系“触底反弹”。同时，中国积极建设“一带一路”并开始取得实质进展，特别是亚投行的筹建与成立，促使日本开始关注“一带一路”。而围绕是否加入亚投行这一现实问题，日本政府经过紧急磋商，最终放弃加入，反映出日本对于“一带一路”消极、警惕的态度。

2014 年 10 月下旬，中国等 21 国在北京签署“亚投行筹建备忘录”。2014 年底到 2015 年初，日本政府开始通过一些渠道调查中方计划，包括接触预定出任亚投行行长的中方高官。但是，负责调查的外务省、财务省官员对亚投

<sup>①</sup> 根据笔者 2015 年 10 月 7—9 日在日本调研时对日本外务省亚大局官员横地晃、早稻田大学教授筱原初枝的采访。

<sup>②</sup> 「アジア投資銀の衝撃『G7の参加、絶対ない』、『日本経済新聞』2015 年 4 月 15 日。

行持抵触态度，直接影响了首相官邸的决策，导致日方并未积极回应中方的诚意邀请，错失了合作机会。<sup>①</sup> 进入 2015 年，亚投行意向成员国阵营扩大，特别是英法德意等欧洲国家的加入，让误判形势的日本陷入“外交被动”。不仅在野党批评安倍，执政党内部的不同声音也公开化。<sup>②</sup>

日本执政党及政府内部经紧急商议，确定了暂不参与亚投行、同时“不否定将来合作可能”的立场。日本对“一带一路”态度仍相对消极，采取“骑墙立场”，怀疑中方意图，拒绝合作提议成为政策方向与舆论的主流。<sup>③</sup> 2015 年 3 月 31 日，即亚投行创始国申请截止日，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表示，日本对加入亚投行“极其慎重”，这实际上放弃了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国的机会。4 月 22 日，安倍在雅加达亚非领导人会议上见到习近平主席时表示，日方认识到亚洲对基建投资需求巨大，“愿基于这一认识同中方探讨亚投行问题”。但安倍此后在访美时又对奥巴马重申，在亚投行问题上“日美同进退”。<sup>④</sup> 2015 年 6 月 29 日，亚投行 57 个创始成员国在北京签署《亚投行协定》，日本最终也没有参加。但是，受到以上形势的刺激，日本国内关于“一带一路”的议论迅速升温，媒体报道显著增多。“一带一路”和亚投行获得“超出日本预想的外部支持”这一事实，不仅迫使日本政府加强了关注，也促使日本民间特别是经济界对中方倡议产生了兴趣。

### （三）局外观望与对策布局期（2015 年下半年至 2017 年春）

在“是否加入亚投行”的争议暂时平息后，日本政府不再就“一带一路”频繁对外表态，而是以“局外观望”的姿态，一方面持续关注中方动向，另一方面有针对性地加强竞争措施。日本政府趋向于认为，由于中国推进“一带一路”的强烈意志及财力优势，日本所面临的竞争压力将增大。特别是 2015 年下半年在印尼雅万高铁项目竞标中输给中国，激发了日本的危机感与竞争心理。为此，日本在基建项目出口、地区贸易机制构建等方面发力，与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展开竞争。日本国内有观点认为，这一阶段是

① 「日本の対処後手に 英の参加誤算、6 月末までに再判断」、『日本経済新聞』2015 年 4 月 1 日。「アジア投資銀、幻の日本人副総裁」、『日本経済新聞』2015 年 4 月 15 日。

② 「野党、政府のアジア投資銀対応を批判」、『日本経済新聞』2015 年 4 月 1 日。「アジア投資銀『交渉参加も選択肢』民主代表」、『日本経済新聞』2015 年 4 月 20 日。

③ 根据笔者 2017 年 8 月对日本佳能全球研究所濑口清之的采访。他认为，由于“无法充分掌握中方具体设想”，日本当时认为中国将垄断亚投行权力并将其私用。尽管日本政府和执政党内部也有“不要错过参与机会”的意见，但是“对中国计划的不信任”最终主导了政策讨论。

④ 「日米首脳、アジア投資銀『公正な統治必要』」、『日本経済新聞』2015 年 4 月 30 日。

日本重点观察 “一带一路” 运行并加速应对策略布局的时期。<sup>①</sup>

同时，基于 “不否定将来合作可能” 的立场，日本政府尝试与中方继续接触，并以支持亚开行与亚投行开展融资合作作为为日本保留 “一带一路” 参与余地的主要途径。2015 年 6 月，中日财长对话时隔三年两个月重启，会议通过的共同文件称，中日在推进亚投行与亚开行融资合作上达成一致。2016 年 5 月亚开行年会上，亚开行与亚投行签署备忘录，启动合作融资进程，约定定期举行成员国之间的高级别磋商。<sup>②</sup> 在关注 “一带一路” 的舆论风向下，日本官方及民间机构发表了一系列政策报告，重点关注中国政府推动基建项目出口、支持中国企业投资周边各国的进展。日本经济界人士借访华之机也开始探询 “一带一路” 的进展及日中可能合作的空间。<sup>③</sup> 不过，基于日本政府 “不鼓励（与中方）合作” 的态度，加上对中方计划的各种疑虑，绝大多数日本企业此时对参与 “一带一路” 仍持观望态度。<sup>④</sup>

#### （四）转向积极参与期（2017 年春至 2017 年冬）

这一时期，与中日关系趋向改善、官方和民间交流恢复同步，日本政府对 “一带一路” 的态度转向积极，体现为一方面前所未有地正面评价 “一带一路”，另一方面明确表示在 “一带一路” 框架中与中方合作的意愿。

2017 年 4 月 25 日，日本政府宣布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将作为首相特使访华，于 5 月中旬参加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并最终成行。<sup>⑤</sup> 5 月 2 日，日本央行行长、前亚开行行长黑田东彦在亚开行研讨会上称，亚投行有利于亚洲基建事业和经济增长。6 月 5 日，安倍在东京的 “亚洲未来会议” 演讲时高度评价 “一带一路”，称这一倡议 “具有把东洋、西洋以及在其中的多样的地区联系在一起的潜力”，表示 “愿意（条件成熟时）进行合作”。7 月在汉堡二十国集团（G20）峰会期间，中日首脑会面，安倍又评价 “一带一路” 是 “有潜力的构想”，首次当面向中国领导人表达合作意愿。<sup>⑥</sup> 8 月初，日本自民、公明两党与中方在东京举行 “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第六次会议”，

① 浜田和幸「中国の進める現代版シルクロード『一带一路』戦略の行方」、『産業新潮』2017 年 6 月号、24 頁。

② 「対 AIIB、戦略に変化 ADBは協調融資」、『朝日新聞』2016 年 5 月 7 日。

③ 「AIIB、逆風下の船出中国減速でも貢献強調 低開発国へ新たな拠出表明」、『朝日新聞』2016 年 1 月 17 日。

④ 根据笔者 2015 年 10 月 7—9 日在日本调研时对外务省政策调查官冈田胜的采访。

⑤ 「中国の一带一路構想『積極的に協力する決意』二階氏」、『朝日新聞』2017 年 5 月 15 日。

⑥ 「日中、関係改善手探り首脳会談で一带一路に協力表明」、『日本経済新聞』2017 年 7 月 8 日。

安倍会见出席会议的中联部部长宋涛。会后通过的《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第六次会议共同倡议》中称，中日执政党将就“一带一路”讨论具体合作方式。

在日本政府明示合作意愿的情况下，日本民间开始探讨合作可能。经团联、商工会议所、经济同友会等经济团体公开支持日本企业参与“一带一路”。2017年6月21日，由在华投资的日本企业组成的“日本中国商会”宣布设立“一带一路联络协议会”，以共享“一带一路”相关商业信息，推动日本企业参加中方计划。<sup>①</sup>日立制造所、三菱、住友等日企对参与“一带一路”表现出积极态度。一些日本物流企业对中国在中亚地区支援当地基础设施建设给予高度评价，计划开展合作。<sup>②</sup>

#### （五）进一步探讨合作期（2017年冬至今）

这一时期，日本政府继续释放合作信号。2017年11月14日，中日首脑在越南岷港 APEC 峰会会面。安倍再次表示，将积极探讨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合作。<sup>③</sup>12月4—5日，中日企业家参加的“中日 CEO 峰会”在东京举行，安倍出席会议并发表演讲，经济产业大臣世耕弘成参加了研讨。会议发表联合声明，提议日中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就亚洲基础设施开发更紧密合作。<sup>④</sup>12月下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与公明党干事长井上义久访华并参加“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第七次会议”，二阶在北京发表演讲称，应以“一带一路”构想为背景，推动日中企业携手在沿线国家开展商业活动，并提议尽快召开部长级的“日中高层经济对话”。<sup>⑤</sup>各种迹象显示，日本政府和执政党高层在与中国合作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方面已经形成了“统一口径”。

同时，日本做出与中方在“一带一路”框架中具体探讨合作方式的姿态。日本内阁官房牵头外务省、财务省和经济产业省制定了日本参与“一带一路”的具体方案，包括重点合作领域与可能合作项目。<sup>⑥</sup>2017年12月底在中国福建举行的“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第七次会议”汇总了中日双方的合作设想，参

① 「中国進出の日系企業、『一带一路』で協議会アジア投資銀への対応を日米で協議せよ」、『日本経済新聞』2017年6月21日。

② 「日通、中央アジア横断で貨物輸送 カザフ鉄道と提携」、『日本経済新聞』2017年9月15日。

③ 「（社説）日中首脳会談 接点見いだす努力こそ」、『朝日新聞』2017年12月14日。

④ 「第三国進出、中国企業が協力『一带一路』で連携 日中 CEO サミット」、『朝日新聞』2017年12月6日。

⑤ 「二階氏、『一带一路』への協力再び示す 中国で講演」、『朝日新聞』2017年12月26日。

⑥ 「日中企業協力促進、『一带一路』で指針 政府、省エネなど3分野」、『朝日新聞』2017年12月5日。

会的二阶和井上回国后专门向安倍进行了汇报。<sup>①</sup>《读卖新闻》援引外务省官员说法称，日本政府准备邀请中国参与日本实施的“非洲开发事业”，这是日本首次提议日中合作参与援建非洲。<sup>②</sup>

中日民间的合作更趋活跃。2017 年 11 月下旬，“史上最大规模”的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访华，对“一带一路”框架内开展产业、金融与科技合作表现出浓厚兴趣。中国领导人对中日合作的积极态度，让日本经济界人士深受鼓舞。<sup>③</sup>通过与中方的交流，日本经济界的合作设想更趋具体化。一些能源、交通和物流企业，率先宣布了自己的初步投资计划。<sup>④</sup>2017 年 11 月底，由数十名日本学者发起的“一带一路”日本研究中心在东京成立。2018 年 1 月，日本冲绳县经济团体“琉球经济战略研究会”与中国企业联合体举办“一带一路冲绳论坛”，签署了合作备忘录。<sup>⑤</sup>这些动向反映出，日本经济界已切实地开始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中寻找商机。

## 二、日本现阶段“一带一路”应对政策的特征

当前，日本政府不仅明示合作意愿，而且开始与中方探讨合作方式，为中日民间围绕“一带一路”开展合作创造了条件。但是，日本政府与中方倡议进行对接时，刻意留有余地，强调在合作理念及方式上与中方的差异性。同时，日本在“一带一路”框架之外，也调动战略资源，采取多方面针对措施，与“一带一路”以及日益增强的中国影响力形成了直接竞争。基于此，可以将当前日本对“一带一路”的政策概括为“有限度对接”和“多角度对冲”。

### （一）日本对“一带一路”的“有限度对接”

与“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有限度对接”方面，日本政府的对策体现为：

第一，为参与“一带一路”合作设置前提条件，试图以此“约束”中方的行动。此前日本对“一带一路”特别是亚投行持消极态度时，反复在组织原则公正性、决策透明性以及贷款项目的专业性等方面发难，质疑中国的合作倡议。在对“一带一路”态度转向积极后，日本政府仍将这些质疑中的要

① 「日中与党協議 経済連携で一致『一带一路』具体策探る」、『日本経済新聞』2017 年 12 月 26 日。

② 「アフリカ支援、中国構想に協調 日中協力提案へ」、『読売新聞』2017 年 12 月 31 日。

③ 「『日本企業、中国に投資を』李首相、財界訪中団に要請」、『朝日新聞』2017 年 11 月 22 日。

④ 「一带一路、積極関与を模索 日本企業 商機、中国が後押し」、『朝日新聞』2017 年 11 月 25 日。

⑤ 「『一带一路』沖繩展開を模索 中国・沖繩 11 社が事業協力で覚書」、『共同通信』2018 年 1 月 9 日。

点和逻辑转为日中合作的前提。如安倍在2017年6月5日演讲中，就“一带一路”基建合作提出了四个前提：项目全面开放、透明且公平的采购程序、确保项目具有经济效益、不损害借款国的财政安全。日本官方学者指出，这些前提既基于“大义”即所谓自由、民主、人权等“普遍价值观”，又符合日本的战略利益，是日本参与“一带一路”应有的根本出发点。<sup>①</sup> 基于这一立场，日本政府仍坚持不加入亚投行，政府和执政党高官在表示合作意愿的同时，不断重申这些前提条件，向中方“提要求”，要求中方“守规则”。

第二，将“一带一路”与日本的地区战略构想进行融合。安倍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一带一路”应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所代表的“自由且公平的经济圈”进行融合，形成“覆盖更广、标准更高”的经济合作体制。2017年底日美公开宣布共推“印太战略”后，安倍积极主张将“印太战略”和“一带一路”进行融合，12月4日在“中日CEO峰会”上表示“我国（日本）认为，在‘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下，也可以与倡导‘一带一路’构想的中国大力合作”，表达了“印太战略”与“一带一路”共存乃至融合的观点。<sup>②</sup> 此后，2018年1月，安倍在国会施政演讲中表示，在与“共享价值观的国家”合作、维护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的大前提下，“我们也将与中国合作，回应亚洲不断增长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sup>③</sup> 可以预见，围绕“一带一路”，从日本地区战略框架出发，“以我为主”地推进日中合作乃至寻求“战略融合”，将成为日本设计及表述对外政策的一条主轴。

第三，不设官方合作框架，以民间为主进行个案推进。日本政府当前的方针是：不以政府主导的形式，而是采取支持日中民间企业在第三国投资活动即“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方式，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合作。可能采取的方式包括：为日中共同投资项目提供融资支持，协调日中企业联合市场调查、联合竞标及研发合作等。另外，已经先行启动的亚开行一亚投行合作融资体制也将继续维持。日本经济官员指出，“有特定官民合作方式”的日本会采取与中方不同的方式。<sup>④</sup> 日本政府拒绝“一揽子合作”，主张对每个民

① 北岡伸一「ASEAN50年と一带一路 日本、自主・自立・統一支援を」、『日本経済新聞』2017年11月14日。

② 「安倍首相、一带一路と連携へ 対中けん制から転換」、『共同通信』2017年12月16日。

③ 安倍晋三「第百九十六回国会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http://www.kantei.go.jp/jp/98\\_abe/statement2/20180122siseihousin.html](http://www.kantei.go.jp/jp/98_abe/statement2/20180122siseihousin.html) [2018-01-20]。

④ 篠田邦彦「中国の『一带一路』構想の現状と日本としての経済交流のあり方について」、『日中経協ジャーナル』2017年7月号、22頁。

间合作项目乃至案例进行详细研究,表现出谨慎、渐进合作的姿态。<sup>①</sup> 日方认为,不以“官方对官方”的方式,而以民间组织出面、通过“个案推进”来与中方协调合作,更具有弹性,可以规避风险,也更符合日本的利益诉求。<sup>②</sup>

第四,严格限制与中方的合作领域。在将节能环保合作、产业升级和提高物流网便利性设为重点合作领域的同时,日本政府对一些“特殊领域”保持敏感,“强烈建议”经济界“筛选”合作项目,将“一带一路”相关基建项目划分为安保领域和非安保领域。特别是关于港口、铁路和机场等“可作军事用途”的基建项目,不建议与中方合作。日本政府官员“特别关注”中国政府在印度洋和地中海的“地理要冲”支持国有企业开发当地港口的动向,认为其服务于中国的海外军事战略,故“日本政府不会考虑在这方面与中方合作”。具体操作上,则以劝告方式,告诫日本企业“不要涉足”这些领域或警惕风险,官方金融机构将拒批这些项目的融资申请,同时也“提醒”民间金融机构谨慎行事。但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又大力支持本国企业与中国以外的第三国合作,投资具有战略意义的铁路和港口设施。<sup>③</sup>

## (二) 日本对“一带一路”的“多角度对冲”

对“一带一路”实施“多角度对冲”、与中国展开战略竞争方面,日本政府建立、采用了有针对性的政策框架及工具,其中不少作为制衡中国的手段,已经使用了相当长时间。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同意参与“一带一路”合作框架的同时,在框架外运用这些政策手段的力度并未减弱,反而有所增强,出现了新的议程与特点。现阶段,日本“多角度对冲”的重点政策包括:

第一,积极实施“高质量基础设施出口战略”。考虑到基建项目出口在“一带一路”构想当中的重要位置,通过该战略与中方争夺海外基建投资权益,成为日本对冲“一带一路”的核心政策框架。2015年5月,安倍宣布面向亚洲国家的“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计划。<sup>④</sup> 日本强调自身基建项目的“高质量公共产品特性”。<sup>⑤</sup> 同时,动用各种资源,扩大对向海外出口

① 如2018年1月初,安倍在听取二阶俊博、井上义久两位执政党干事长汇报后表示,“日本要对(一带一路)每个项目具体研究”,逐项确认合作可能性。参见:「首相、一带一路を案件ごと判断」、『日本経済新聞』2018年1月11日。

② 真家陽一「中国視窓 一带一路で進む海外進出」、『エコノミスト』2017年5月16日号、59頁。

③ Veysel Tekdal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t the Crossroads of Challenges and Ambitions”, *The Pacific Review*, October 2017, p. 223.

④ 2015年5月日本提出该战略时,宣称将在2016—2020年向亚洲新兴国家提供基建贷款1100亿美元。2016年5月伊势志摩七国集团(G7)峰会上,日本又宣布将贷款数额提升到2000亿美元。

⑤ 外務省『「質の高いインフラ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のフォローアップ策(詳細版)』、<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oda/files/000112659.pdf> [2018-01-30]。



基建项目的资金支持，包括运用政府开发援助（ODA）贷款援助亚洲重点基建项目，强化日本与亚开行的合作，设立新的融资框架，利用公私合作（PPP）模式扩大资本来源，修改政策法规、简化融资程序，解禁高风险基建项目融资等。日本以“官民并举”方式在海外积极公关，争夺项目投资权。从战略设计到具体实施，日本明显表现出扬长避短、针对中国的态势。

现阶段，日本在“高质量基础设施出口战略”上加大力度，针对中国的竞争表现为：首先，加强自身战略设计。2017年11月，日本政府公布了电力、铁路和通信三大领域基建项目出口的“海外拓展战略”，宣布将加强“打包型系统输出”，扩大新兴市场份额。其次，扩大融资来源。2017年亚开行年会期间，日本宣布与亚开行新设基建基金，未来两年为亚洲交通基建和清洁能源项目提供4000万美元贷款。<sup>①</sup>再次，紧跟中方动向，加大公关力度，组建更具实力的竞标团队争抢重点项目（如新马高铁）。近期，日本力争向孟加拉国、缅甸等国出口基建项目，与土耳其合作开发第三国基础设施，向非洲和中东出口项目。日本媒体指出，考虑到中国企业已中标的海外基建项目出现了延期和合同调整的情况，“日本政府正利用机会，加紧制定‘反击’政策”。<sup>②</sup>

第二，加速推进“高标准自由贸易体制”。该战略是日本在经济上对冲“一带一路”倡议的另一重要政策框架。这一战略的出发点是：日本认为中国将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构建并主导新的经贸金融体系，与日美主导的现有体系进行竞争。<sup>③</sup>因此，日本大力倡导基于西方法律及价值观的发达国家的“高标准贸易规则”，寻求掌握贸易规则主导权以制约中国在多边经济体制中的影响力增长。日本原计划将日美联合主导的TPP作为“高标准自由贸易体制”的中心，特朗普上台后宣布退出TPP，迫使日本对既定策略做出调整，“倒逼”其更主动地扛起贸易自由化大旗，积极参与各种地区贸易体制特别是“超级FTA”的构建，尽力将“高标准贸易规则”注入这些体制中。

现阶段，日本继续推进“高标准自由贸易体制”的具体表现为：首先，单独主导继续推进TPP，最大限度保持并利用该体制的体系、规则和影响力。在2017年，日本主办了四次TPP高官会谈，积极弥合各国分歧，促成了新的“全面且先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其次，大力推进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将其作为“高标准自由贸易体制”的另一支点。日本

① 「ADB50年、探る存在感中国主導 AIIBに勢い」、『朝日新聞』2017年5月10日。

② 「政府、インフラ輸出強化計画を発表」、『日本経済新聞』2017年12月8日。

③ 大橋英夫「TPPと中国の『一带一路』構想」、『国際問題』2016年6月号、30頁。

希望借日欧 EPA 拓展经济影响力, 并促使美国“重新考虑参与多边经济框架”。<sup>①</sup> 除与西欧各国协调外, 日本还谋求借日欧 EPA 强化与中东欧国家的经贸关系。由于中东欧在“一带一路”的陆路上具有重要战略地位, 这一举措也被认为是对中国的牵制。再次, 日本积极参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谈判, 试图主导其规则制定过程。在大多数谈判国希望尽快达成协议的情况下,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世耕弘成在 2017 年 9 月 RCEP 部长级会谈中呼吁“应当达成高质量的协定”, “即使用更长时间, 也要坐下来好好谈”。<sup>②</sup>

第三, 有针对性地参与、推进地区开发项目。参与别国或区域经济开发, 不仅能够推动日本民间资本向海外输出, 支持日本基础设施出口战略, 而且很大程度上会强化日本与对象国之间的经济乃至战略关系, 成为日本推行地区战略的重要资源。日本长期参与亚洲新兴国家的地区开发, 并逐步将合作模式从传统的经济援助、人才交流升级到共同项目规划、联合投资建设等高级方式, 从而加强了与相关国家的利益捆绑。目前, 日本参与的地区开发项目集中在东南亚、南亚, 与“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大部重合, 这一地区也成为中日通过参与地区开发开展经济竞争的前沿阵地。另外, 日本还积极寻求进入中亚、非洲。特别是以“非洲发展国际会议”(TICAD) 为核心机制推进对非经济外交, 进一步扩大了在非洲国家市场中的份额。

当前, 日本通过参与地区开发项目对冲“一带一路”的做法, 体现出“以点带面”的特点。一方面日本着力重点推进一些“战略支点”项目, 支持印度建设“德里—孟买产业大动脉”和“金奈—班加罗尔产业走廊”, 主导孟加拉湾地区开发计划、缅甸土瓦地区开发, 参与东非的蒙巴萨北部走廊、纳卡拉走廊开发等。2017 年, 日本以建设“海洋经济走廊”为名, 加大了对印度洋港口的投资, 协助印度、印尼开发离岛。<sup>③</sup> 日方承认这些项目不仅在地理位置上有“战略价值”, 而且与中国的开发项目“交错分布”, 意在“打入楔子”, 避免中国独占该地区经济资源及市场。<sup>④</sup> 另一方面日本还积极构建区域性、中长期开发规划。2017 年, 日本和印度开始公开推进“亚非增长走

① 「揺れる世界と日本危険な保護貿易主義の拡大を防げ」、『日本経済新聞』2018 年 1 月 6 日。

② 「RCEP 年内妥結、各国歩み寄り焦点あす、比で閣僚会合」、『朝日新聞』2017 年 9 月 9 日。

③ 比如, 日本与印尼签署协议协助开发巴丁港, 与印度联合推进斯里兰卡亭可马里、伊朗恰赫巴哈尔、缅甸土瓦等港口开发, 收购柬埔寨西哈努克港股份, 计划对斯里兰卡科伦坡、缅甸迪拉瓦和泰国兰查邦等港口项目加大投资。同时, 宣布与印度联合开发安达曼·尼科巴群岛与拉克沙群岛, 与印尼共同开发纳土纳群岛等。

④ 新治毅「中国の「一带一路」と日本の安全保障」、『治安フォーラム』2017 年 12 月号、51 頁。

廊”(AAGC)构想,计划在“印太战略”背景下联合构筑跨区域的产业走廊和经济网络。由于“亚非增长走廊”在涵盖地区及主要内容上与“一带一路”的构想高度类似,因此这也被认为是针对“一带一路”的竞争性政策框架。<sup>①</sup>

第四,在“印太战略”下强化“海权同盟”与海洋安全合作。日本致力于构建的“海权同盟”以日美同盟为基础,以日本与一些亚太、印度洋国家日益强化的战略伙伴关系为骨干,以维护“海洋国家”共享的所谓共同价值观为名义,重点通过军事合作联络“战略盟友”,以牵制中国“日益活跃的海洋行动”以及在“一带一路”的海路沿线日益扩大的影响力。在这方面,日本重点推进“印太战略”并强化其政治安全特性和对华遏制功能。2017年特朗普访日时,美日宣布共推“印太战略”。日本更为积极地推动日美印澳四国战略合作,强化这一在战略与安全领域对冲“一带一路”的主要政策框架。

当前,日本在“印太战略”背景下强化构建“海权同盟”、推进安全合作的表现包括:首先,以日美印澳四国战略为基础,重点加强与印、澳两国的政治安全合作,巩固“战略支点”。2017年,日印做出进一步“战略协作”姿态,从防务装备合作与联合训演入手强化双边军事合作;日本还积极寻求与澳大利亚签署《军事到访协议》,强化军事合作框架。其次,继续以“能力建设支援”的系统性方式推进与东盟各国的军事合作,加大对这些国家军事能力建设的扶持,加强ODA在这方面的“战略性利用”。<sup>②</sup>再次,持续做出深度介入南海局势的姿态。支持美国在南海的“自由航行行动”并派舰船为美航母舰队护航,值得关注的是,日本计划加强在南海、印度洋国家港口的“战略性停靠”。<sup>③</sup>最后,日本进一步加强针对中国的舆论战力度,利用各种场合炒作“中国威胁论”,歪曲中国正当的海洋维权活动。

### 三、日本当前对“一带一路”政策的动因

如上所述,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已由消极转向积极,其政策

<sup>①</sup> “亚非增长走廊”范围涵盖印度洋及西太平洋,其四大支柱为发展与合作项目、高质量基建和软件联通、能力与技术提升、人员交流伙伴关系。参见:Titli Basu “Thinking Africa: India, Japan, and the Asia - Africa Growth Corridor”, *Diplomat*, June 3, 2017.

<sup>②</sup> 2018年2月日本新版《ODA白皮书》称,将在“印太战略”下,“在确保海上交通和完善法制方面支援发展中国家”,继续向东盟国家提供巡逻船,为各国培训安保人员,援建岛屿雷达和港口设施等。参见:「インド太平洋戦略 ODA 活用外務省方針」、『日本経済新聞』2018年2月19日。

<sup>③</sup> 「海自、インド太平洋の中国が開発主導の港湾施設への『戦略的寄港』強化」、『産経新聞』2018年2月12日。

不仅明显具有合作与竞争的两面性，且合作和竞争都在不断强化，即不仅“两面下注”，而且“两面加注”。把握当前日本的“一带一路”应对政策，既要关注其“为什么（转向）合作”，也要关注其“为什么（加强）竞争”。

### （一）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态度转变的基本动力

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发生转向的基本动力，来自于改善中日关系的“短期需要”，以及应对美国对外政策变化以“预留行动空间”的需求。日本当前的“一带一路”应对政策，与中日关系的总体态势以及中日美三边互动直接相关。日本转向与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合作，固然不排除通过合作分享红利的长期考虑，但还是以满足眼下的政治乃至战略目标为优先。<sup>①</sup>为实现政治需求，以“一带一路”为“杠杆”推动中日关系改善（至少取得某些“短期成果”），并借此应对美国地区战略的不确定性，为自己“预留行动空间”，成为日本对“一带一路”转向合作的基本动力。

在改善中日关系方面，日本将日中合作推进“一带一路”作为拉近两国距离的主要抓手。日本认为，相比“高政治”议题，“低政治”领域的经济合作更容易“短期见效”，而且支持中国领导人亲力亲为推动的这一倡议，有利于迅速强化日中领导人之间的信任关系。<sup>②</sup>日本之所以急于改善日中关系，一方面是安倍欲借此拉升国内支持率，特别是在 2017 年因政治丑闻导致政权支持率创下新低，期望推进修宪等敏感政治议题的背景下，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另一方面是希望借此与中方进行“利益交易”，比如在朝核问题上协调立场、利用日中经济合作提振国内经济等。从日本角度看，即使无法与中国进行“利益交易”，通过合作姿态争取日中关系改善这一“现实可见的成果”（比如中日领导人会见），对于日本而言有益无害，特别是在日本国内持续要求安倍改善与邻国关系的情况下。<sup>③</sup>一般来说，在国内对外交议题有特定关注点的背景下，领导人可能通过国际合作来避免国内政治出问题，从而有利于

<sup>①</sup> Wade Shepard “Did Japan Just Jump On China’s Belt And Road Bandwagon?”, Forbes, <https://www.forbes.com/sites/wadeshepard/2017/07/11/has-japan-just-jumped-on-chinas-belt-and-road-bandwagon/>[2018-01-20].

<sup>②</sup> 川島真「トランプ政権下の米中関係の行方と日本の対中戦略」、<https://www.nippon.com/ja/in-depth/a05302/>[2018-01-20].

<sup>③</sup> 日本輿情人士指出，当前评价政府外交政策的一项重要指标是“能否管理与中国的紧张关系，将战略互惠关系具体化”。参见：言論 NPO「2017 年衆議院選挙マニフェスト評価（外交・安全保障）」、<http://www.genron-npo.net/politics/archives/6786.html> [2018-02-20].

选举并争取特定利益集团的支持。<sup>①</sup> 安倍正是遵循了这一普遍逻辑。

在美国因素方面，特朗普上任后美国亚太政策的调整（包括退出 TPP）显然影响了日本的对策，但日本倾向于与中国合作的行为并非针对此事做出的单纯“战术调整”，而是在评估特朗普整体外交政策的不确定性后进行的更高层次的“战略调整”。日本认为，特朗普执政下的美国“国内政治主导外交”倾向将加剧，意识形态情绪和党派团体利益随时可能左右外交决策，所产生的不确定性难以避免，且可能继续增长。<sup>②</sup> 在此情况下，日本需要预留“行动空间”，包括与日美共同的战略对手——中国缓和关系，以避免美国政策突变时陷入被动，为日本增加选择。日本已意识到，美国官方对“一带一路”的评估仍较消极，如美方人士指出，中美间的战略协调并不稳定，“白宫正日益透过（战略竞争的）棱镜来看待‘一带一路’”。<sup>③</sup> 但只要中美不爆发公开对抗，日本仍计划借“一带一路”拉近与中国的距离，并借助中日关系制约美国，在与美国的交涉中强化自身立场。也有日本战略学者谈到，考虑到中美在亚太（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竞争势必强化，“（日本）为了确保行动自由，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是必要的”。<sup>④</sup>

## （二）日本对“一带一路”采取“有限度对接”的原因

日本在“一带一路”合作中设置各种条件和限制，是外交博弈中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主选择，也反映出中日合作欠缺必要互信情境的现实。日本将参与“一带一路”合作不仅看作一项经济合作议程，而且看作一项推动日本外交的“政治交涉”。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尽可能设法增强自己的策略弹性，扩大回旋余地，设置各种条件、限制，尤其注重在合作框架内坚持自主原则和自我利益主张。日本这一行为模式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这种“理性选择”与中日关系当前所处的“情境环境”有直接的关系。

从认知角度出发，一国对合作或竞争行为的选择受制于“情境环境”，即相关国家究竟处于冲突性情境还是合作性情境中。长期的冲突情境（持续对抗）将抑制当事方的合作倾向，使其更趋于怀疑对方的合作动机，并具有更

① Helen Milner, *Interests, Institution and Information: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46.

② 「久保文明・東大教授：国際主義への反逆で揺らぐ世界秩序」、『週刊東洋経済』2017年7月14日号、25頁。

③ James Andrew Lewis and Matthew P. Goodman, *Meeting the China Challenge: Responding to China's Managed Economy*, Centre of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Report, January 2018, p. 42.

④ 中西寛「戦後秩序の動揺と日本外交の課題」、『国際問題』2018年1—2月号、12頁。

强的讨价还价以争取利益的倾向。只有相关国家脱离冲突性情境，才会逐步放弃这些对抗性认知，进而降低为合作所设置的前提和障碍。<sup>①</sup> 目前，中日关系正处于从冲突性情境到合作性情境之间的过渡阶段，作为合作倡议响应者的日本在合作倾向上的相对保守，反映出其对中方的信任缺失。正如有欧美学者指出的，日本目前的对华政策具有鲜明的“风险管理”的特征。比起可能产生的合作前景和共同收益，日本更倾向于规避风险和确保“出口”，高度关注日本单方面相对收益，尤其担忧在合作中丧失主动性的问题。<sup>②</sup>

基于以上背景，日本坚持在“一带一路”框架内与中国“有限度合作”。首先，日本有意保持对“一带一路”合作的暧昧态度，在继续以合作姿态影响中方的同时，确保日本的“行动自由”，随时根据形势推进或退出合作。<sup>③</sup> 其次，面对中国加强合作的倡议，日本采取“步步为营”的策略，谨慎地设定合作限度，使得日本的合作提议能够发挥最大的筹码效用。日方认为，中国对日本“具有优势意识”而且倾向于强硬施压，如果日本明确表示合作并迅速落实，则中国会进而向日本施压，迫使日本做出更多让步，因此日本应留出策略空间，采取“切香肠的方式”，将每一步合作举措都作为筹码加以应用。<sup>④</sup> 再次，日本试图通过在合作中主张自己原则，包括以自己的地区战略主张“融合”中方政策，限制中国的行动。正如一些外部观察者指出的，日本有“主动而精巧的设计”，打算“以谨慎而警觉的方式逐步影响中国的行为方式，甚至改变其策略”，使其尽可能有利于日本的国家利益。<sup>⑤</sup>

### (三) 日本强化对“一带一路”的“多角度对冲”的主要动力

日本针对“一带一路”的竞争措施，其主要动力来自对华战略竞争的长期目标，及在国际秩序变动期争取主导权的强烈意识。日本在转向参与“一带一路”合作的同时，也加强了针对“一带一路”的竞争措施。显然，这一趋势受到与中国战略竞争的中长期目标的牵引。特别是在中日权力转移加速的情况下，日本抢抓“机会窗口”的紧迫感增强，而 2017 年以来国际形势的

①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50-4.

② Sebastian Maslow and Ra Mason, *Risk State: Japan's Foreign Policy in an Age of Uncertainty*, Routledge, April 2016, p. 4.

③ Charlotte Gao, “‘Aimai’: Japan's Ambiguous Approach to China's ‘Belt And Road’”, *Diplomat*, November 22, 2017.

④ 「中国の一帯一路に是々非々で対応せよ」、『日本経済新聞』2018年2月22日。

⑤ Titili Basu, “Japan's Belt and Road Puzzle, Decoded”, *Diplomat*, February 28, 2018.

变化，特别是国际秩序重组变革加快的趋势更强化了日本的紧迫感。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指出，在权力转移过程中，处于相对衰落的一方对他国的影响与主导能力下降，同时出现机会窗口（脆弱性窗口），对其意味着攻击（或压制）对手的机会正在减弱，以及日益增长的、面对对方压力的脆弱性。机会窗口的存在，使相对衰落的国家倾向于在权力转移完成前动员力量，开展针对崛起国家的竞争（极端情况下为战争），以避免在处于弱势情况下谈判。<sup>①</sup> 这一假定的前提是相对衰落一方仍有较强意愿维持优势地位，而日本正是如此。

近年来，日本对中国战略定位、走向的判断发生了变化。当前日本战略观察者的中心论点是：一方面，中国的国家定位因其国家实力的增长而获得坚实后盾，已成为世界大国；另一方面，中国的对外战略正趋向主动，在改变现有秩序格局、挑战美国霸权方面，中国不仅逐步具备能力，而且意志强硬。在地区层面，中国正争取、扩大对日本的力量优势，加速中日之间的权力转移过程，体现为中国影响区域乃至全球秩序的能力和意愿同步增强，以及试图排斥日本（及美国）的安排与影响。提出并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成为这一倾向的证明。<sup>②</sup> 而且，进入2017年，日本对国际形势的基本看法是：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正陷入前所未有的衰落动荡期，原因是过去主导该秩序的欧美各国“内部崩溃”，包括特朗普政策的反全球化、反自由主义因素，西欧各国日益强化的民族主义、反移民（难民）倾向，以及国际贸易体制面临冲击、欧盟一体化陷入困局等。<sup>③</sup> 与此同时，中国积极出面“成为新全球化运动的领导者”，寻求填补力量空白并争取秩序、规则的主导权。<sup>④</sup> 在日本看来，传统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动摇对日本而言，既是“生存环境变化”的挑战，也是提升国际角色的机遇。日中之间势必围绕地区乃至国际秩序、规则的，主导权展开新一轮的深层竞争，而现在的秩序变革期对日本正是“关键时间”。

日本战略学者认为，与抢抓机会窗口，争夺秩序、规则的主导权相关，

---

① Stephen Van Evera, *Causes of War: Power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92. 范·埃弗拉将“机会窗口”作为相对衰落国家倾向于战争的原因之一，但在和平前提下，衰落国家抢抓“机会窗口”的策略形式体现为战略竞争。

② Richard McGregor, *Asia's Reckoning: China, Japan, and the Fate of U.S. Power in the Pacific Century*, Vikings, September 2017, p. 10.

③ 山本吉宣「国際秩序の史的展開」、『国際問題』2018年1—2月号、2頁。

④ 細谷雄一「トランプ政権成立後の国際秩序」、『NPI/IIPS Quarterly』第8巻第3号、2017年7月、31頁。

尽管在权力转移过程中，日本相对中国处于“总体劣势”，但在特定方面，通过运用特定策略仍可以与中国抗衡甚至占据优势。作为既存秩序的受益者和参与者，日本无法通过硬实力强行塑造国际环境或新秩序，但在利用软实力稳定和引领现有秩序和规则方面，日本似乎比中国更容易得到认可与支持。<sup>①</sup>一方面，针对“一带一路”，日本在“不能打败它”（can't beat it）的前提下选择了“加入它”（join it），试图发挥日本参与国际体制的经验优势，在影响“一带一路”方向的同时，利用该倡议的关系网络参与国际秩序建构；<sup>②</sup>另一方面，在“一带一路”之外，日本更主动地参与各种多边机制，致力于推广更利于发挥日本技术体制传统优势的“高质量基础设施”和“高标准贸易体制”，以及基于所谓“普遍价值观”的安全合作机制和地区秩序观念，通过多种形式，在制度、法律及舆论方面对中国实施“软制衡”和“消耗战”，增加中国战略实施的成本。<sup>③</sup>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日本仍将运用以上类型的“巧实力”，抓住中日权力转移过程中日本仍能发挥制衡力的机会窗口展开行动。<sup>④</sup>

#### （四）日本国内对“一带一路”的复杂态度及其对合作前景的影响

日本国内支持与反对“一带一路”的力量与观念并存，其复杂态势将影响日本今后对“一带一路”的应对。日本对“一带一路”的政策受到日本国内政治的影响。一般而言，政府主导对外政策中的合作进程，但在政府之外，国内政治行为体的利益和偏好仍可影响国家的合作或竞争行为。其中，从合作中可望得利的利益集团除通过民主体制影响选举外，在国内信息不完全的状况下，还作为信息提供者参与到国家政策的制定中，对政府的选择产生影响。<sup>⑤</sup>在日本，经济界被认为是推动日本参与“一带一路”合作的重要力量，但无论经济界内部还是经济界之外，质疑乃至反对“一带一路”的声音依然不少。日本参与“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内基础”并不稳定，抵触、反对合作的力量和意识仍会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

① 遠藤乾等「国際秩序は揺らいでいるのか」、『国際問題』2018年1—2月号、2—17頁。

② 参见梁海明、冯达旋《日本“地缘经济”布局对“一带一路”的警示》，FT中文网，<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6052?page=2>\* [2018-01-30]。

③ “Japan Takes the Lead in Countering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icago Tribune*, February 2, 2018.

④ 茅原郁生「生き出した中国の『一带一路』戦略—実態を踏まえてわが国も対応を—」、『陸戦研究』2017年8月号、89—92頁。

⑤ Helen Milner, *Interests, Institution and Information: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45.



当前，在日本经济界内部，对“一带一路”的关注与合作意愿正在上升，民间经济团体及研究机构成为“一带一路”相关研究的主力，在一些关键议题上对官方政策产生了影响。有日本经济界人士称，一些日企基于企业利益“保持独立的商业逻辑”，相比政府的僵硬态度更为灵活。但总体上，日本企业现阶段参与“一带一路”的行动还是受制于官方，“在政府所制定的方针下推进”，政府的鼓励措施实施与否，对企业的参与意愿有较大影响。<sup>①</sup> 业务领域不同的日企，对“一带一路”的参与热情有很大差别。一些企业对潜在投资风险仍有较大担忧，不少日企明确表示，担心因中国主导合作倡议，而使日本公司在与中国公司竞争时遭遇“不公平对待”。有日方人士指出，一些日企积极支持“一带一路”合作，与其说是看中参与“一带一路”的收益前景，不如说是为了确保在中国市场的投资和市场份额。<sup>②</sup>

需要看到，即使目前中日关系有所恢复，由于此前中日长期对立导致民间感情恶化，加上近年日本官方及主流媒体对中国持续性的负面宣传、报道，大多数日本民众对通过发展经济相互依赖关系重建日中关系乃至“战略互惠”并不乐观。<sup>③</sup> 日本国内对“一带一路”的认识也在发展，但民众对“一带一路”客观认知渠道有限，且易受到官方舆论方向的影响。目前，一方面，日本民间对于日本参与“一带一路”可能获得的直接经济收益（联合投资、共享商业情报等）及间接经济收益（改善对象国贸易环境、推动内需增长等）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另一方面，日本民间进一步加深了对“一带一路”的“战略性印象”，从日中战略竞争的出发点理解“一带一路”。他们认为，“一带一路”是中方有意识的国家战略行动，且有扩展成“全球性战略”的趋势。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和满足自身战略利益两个目标上，中国会倾向于后者。中国推动的规则、标准在价值观和利益上不利于日本，中国也可能在区域合作中排斥、压制日本。<sup>④</sup> 这也反映出，日本国内对“一带一路”认识的发展，有着自身认知的“主观图式”，并非都支持日中合作。

① 根据作者2017年7月10日对三菱商事东亚地区总裁平井康光和东京财团研究员关山健的采访。

② 根据作者2017年8月27日对《日本经济新闻》政治部主任佐藤贤的采访。

③ 中日舆情机构2017年底公布调查结果称，关于日本是否应在“一带一路”与中国合作这一问题，支持和反对的日本受访民众分别为8%和29%，61%的受访者表示“难以判断”；关于中日能否通过经济合作实现互利共赢，41%的日本受访者认为“很难”，27%认为可行。参见：言論NPO「第13回日中共同世論調査結果」、<http://www.genron-npo.net/world/archives/6837.html> [2018-01-20]。

④ 根据作者2017年7月10日对东京财团研究员关山健的采访。另参见：Rumi Aoyama “One Belt, One Road: China’s New Global Strateg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ast Asia Studies*, Volume 5, 2016.

#### 四、结语

由于支持合作与反对合作（防范和竞争）的动因同时存在，日本的“一带一路”应对政策体现出合作与竞争措施“复合体”的特征。日本政府对“一带一路”的态度转向积极，寻求与中方展开合作，直接动因是为了应对国际形势变化，特别是在中美日三边互动下为日本争取“行动空间”和博弈筹码，具有短期应变的特征和功利色彩。同时，由于中日之间因长期“政冷”而导致缺乏互信情境，以及日本抢抓机会窗口制衡中国，与中国加强秩序、规则竞争，即便在中方邀请下，日本的合作倾向仍较为保守，而竞争姿态则在持续强化。日本国内对于中日围绕“一带一路”开展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看法复杂，中日合作前景更具不确定性。但是，至少可以确定的是，日本官方合作态度趋向积极，为中日合作创造了前提，中日有望围绕“一带一路”逐步创建具体的合作渠道，促进两国民间企业开展互利合作。从中国的角度出发，促使日本在“一带一路”中扮演建设性角色的可能性也在增大。

在中日关系保持协调、合作的同时维持战略竞争这一中长期关系格局趋于定型的情况下，中日围绕地区开发和秩序构建的合作与竞争局面也趋于复杂。中方需要高度关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的“日本因素”，尽可能最大化其正面价值，引导日本参加合作，充分激发日本国内特别是经济界的积极性，通过推进中日合作实践，向日方展示互利前景，增信释疑。同时，中方对日本现行“一带一路”政策中的两面性应有足够认识，对日本政府的“策略布局”，特别是在国际、地区多边机制中针对中国的竞争性措施应重点予以应对。需要指出的是，从中长期看，中日关系保持稳定，有利于两国相互认知趋向正面。中方应不失时机，加强与日本媒体、智库和市民组织的经常往来和机制交流，促使日本民众对华的“认知图式”趋向理性、积极，这将成为支持、推动日本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合力作用的重要基础。

## Japan's Policy towa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rocess, Characteristics and Driving Factors

Lu Hao

Japan's attitude toward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s shifted from negative to positive since China proposed the initiative. At present, Japan's policy toward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an be summarized as "limited cooperation" and "multi-angle hedging", which refers to limited cooperation within the framework while increasing hedging outside the framework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Japan's shift to cooperate with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driven by a "short-term need" to improve Sino-Japanese relations and to "reserve space for action" in response to changes of U. S. foreign policy. Japan sets a variety of restrictions in cooperation to ensure maximum self-interest, reflecting the fact that Sino-Japanese cooperation lacks the necessary foundation for mutual trust. Japan continues to strengthen the countermeasures against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hich is driven by the long-term goal of strategic competition against China, as well as the strong consciousness of striving for the leading role in changes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The perception and public opinion relating to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Japan are also complicated, which will influence Japan's response to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the future.

### 日本の「一带一路」に対する政策 —変化、特徴と動因の分析—

盧昊

中国が「一带一路」を提起した後、日本のそのイニシアティブに対する態度は、消極的なものから積極的なものへと変わっている。現在、日本の「一带一路」に対する政策は、「限度のある連携」と「複数の角度からのリスク回避」と概括される。つまり、「一带一路」の枠組みに条件付きで協力し、同時に、その枠の外では「一带一路」に対するリスク防止対策を強化する。日本は「一带一路」参加へと変わったが、中日関係改善という「短期需要」、アメリカの対外政策の変化に対応して「行動の余地を残す」ことがその基本的な動機である。同時に、日本が協力において様々な制限を設定して自身の利益を最大化しようとするのは、中日協力に必要な相互信頼が欠けている現実を反映している。日本が「一带一路」と競争する措置を強化する主な動機は、中国との戦略競争という長期的目標、および国際秩序の変動期において主導権を握ろうという強い意識である。日本国内には「一带一路」に対する支持と反対の力と観念が併存しており、こうした複雑な状況が日本の今後の「一带一路」に対する対応に影響するだろう。

(责任编辑: 双明)